

# 在国际团结与民族国家之间<sup>\*</sup>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劳工阶级

汪仕凯

**【内容提要】**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劳工阶级及其反抗运动,因此需要我们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理解这一过程。作者以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为基本线索,致力于揭示民族国家整合劳工阶级从而阻碍劳工阶级形成国际团结的主要逻辑。首先,现代世界体系虽然在劳动分工过程将劳工塑造到相近的位置上,也就是从劳动力市场中赚取工资性收入的雇佣劳动者——劳工阶级,但是现代世界体系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其次,民族国家的形成将劳工阶级分散到相互分割的政治地理空间之中,不仅民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会加深劳工阶级的国别差异,而且民族国家的统治策略也会促使劳工阶级积极向民族国家靠拢,从而与民族国家整合在一起。再次,现代世界体系中劳动力商品化的压力和民族国家在劳工阶级内部制造的裂痕,促使劳工阶级不得不主动远离国际团结转而产生界限划分,否则就不可能适应现代世界体系。最后,现代世界体系的维系恰是以劳工阶级的分裂为前提的,所以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实现必须以现代世界体系的改变作为基本条件和构成元素。

**【关键词】** 劳工阶级;现代世界体系;国际团结;民族国家;统治策略

**【作者简介】** 汪仕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上海 邮编:201620)

**【中图分类号】** A8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17)11-0004-31

<sup>\*</sup> 本文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MZD004)的支持。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一 引言

近代以来为世人所熟知的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内容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相伴随的现象则是雇佣劳动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地理分布越来越广,换言之,无论资本主义扩张到何地,它都会在当地制造出以出卖劳动力赚取工作性收入的劳工阶级。虽然劳工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劳工阶级却与资本主义有着深层次的冲突,或是由于不堪剥削、或是因为劳动力商品化摧毁了社会保护网络、或是出于捍卫自身传统地位的缘故,劳工阶级总是发起规模大小不一、持续时间长短有别、斗争激烈程度高低分殊的反抗运动。<sup>①</sup> 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将资本主义扩张与劳工阶级反抗之间的联系总结为“资本到哪里,冲突就跟到哪里”,这其实就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空间转移及其导致的后果所蕴藏的重要规律。<sup>②</sup> 劳工阶级的反抗在大多数情况下诚然是特定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但是隐身在劳工阶级反抗运动背后的巨大力量即资本全球扩张,则要求研究者必须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视野重新检视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问是从现代世界体系视野分析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开拓者,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扩张、全球化进程、劳工阶级反抗运动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并且做出了劳工阶级将达成国际团结的历史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劳工阶级革命理论可以精炼地表述为“工人没有祖国”。<sup>③</sup> “工人没有祖国”既是劳工阶级的政治宣言,又是劳工阶级革命理论的核心逻辑。具体言之,资本主义的扩张将推动劳工阶级力量的壮大,持续不断的反抗过程所提供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促使劳工阶级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最终突破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及其运作过程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国际团结以形成强大的革命大军,进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并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sup>④</sup> 显而易见,国际团结处在劳工阶级革命进程的关键位置上,它的存在与否直接影响劳工阶级革命的前景。

① 关于劳工阶级反抗的原因与模式的总结,参见汪仕凯:《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争议话题》,载《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211—214页。

② 贝弗里·西尔弗著,张璐译:《劳工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91页。

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确实推动了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朝着国际团结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将《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历史概括为三个时期:从1848年到1896年是第一个时期,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在这个时期得以发展壮大,并且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主导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意识形态;从1896年至1948年构成了第二个时期,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在这个时期发展到顶峰,资本主义统治秩序遭遇严重危机,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和社会主义隐约可见,然而就在此时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发生了分裂,演变成革命主义与改良主义相互对立的两翼;从1948年至今是第三个时期,福利制度和劳资谈判重新巩固了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劳工阶级以及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发生了更为复杂的分裂乃至相互对抗,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sup>①</sup>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劳工阶级克服了职业、技术、民族、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广泛地组织了起来,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政党在欧美国家纷纷成立。此时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然而一旦劳工阶级开始向国家寻求帮助,从而处在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与经济保护的位置上时,“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就岌岌可危了”。<sup>②</sup>由于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发生了革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中道受阻,但是修正主义的产生与壮大却并非偶然。历史学家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 Starvianos)在评价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历史时指出:“修正主义者更适合时代的趋向,通常控制着他们各自的政党。确实,他们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在选举竞争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事实上,到1914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已在各自的国民议会中比其他政党拥有更多的席位。”<sup>③</sup>不难发现,修正主义的主张不外是放弃国际团结转而拥抱民族国家,也就是意味着劳工阶级要争取拥有祖国。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长达20年的黄金时期,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为欧美国家整合劳工阶级提供了物质基础。借助福利制度、普选权、集体谈判权等策略,欧美国家成功地将劳工阶级转化为现代国家也就是民族国家的公民。社会科学界对于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进展产生了截

① Giovanni Arrighi, “Marxist Century-American Centur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in Samir Amin, Giovanni Arrighi, Andre Frank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Syste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p.59.

② 贝弗里·西尔弗·艾瑞克·斯莱特:《世界霸权的社会根源》,载乔万尼·阿瑞吉等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4页。

③ 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以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做出了劳工阶级消亡的判断,而以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了劳工阶级制度化的主张。高兹认为劳工阶级向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妥协,将使劳工阶级越来越依赖于民族国家,从而导致了劳工阶级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局面,于是劳工阶级将不再是推动社会—经济根本性变革的政治力量了。<sup>①</sup>李普塞特则认为劳工阶级从挑战现代国家的革命力量转为现代国家内部的制度化力量,劳工阶级的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选举政治中的政治联盟关系上,这就是劳工阶级的大多数选票都投给了左翼政党,因此左翼政党不仅成为欧美国家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甚至成为执政党,实现了社会民主。<sup>②</sup>其实,在相互冲突的主张背后存在重要的共识:劳工阶级已经同民族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劳工阶级不可能突破民族国家政治框架及其运作过程的限制,至于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则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在苏联东欧地区政治制度剧变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再一次突飞猛进,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经济危机开始至今,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在东南亚、东亚、南美、西欧、北美地区此起彼伏,而且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往往同反全球化运动、反血汗工厂运动、环保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相互影响,甚至混合在一起。劳工阶级展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以及反抗运动本身所具备的光怪陆离的色彩,一方面激发了社会科学界研究劳工阶级的兴趣,很多文献宣称劳工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正在实现回归,另一方面也冲击了社会科学界延续几十年的知识传统和理论框架,围绕着民族国家是否仍然是解释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有效政治框架以及国际团结是否应该重新成为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中心问题,研究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持乐观态度的研究者认为,劳工阶级反抗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意味着劳工国际主义的“浴火重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制造了工作与生活条件越来越相似的劳工阶级,也就是说,单一且同质化的世界工人阶级正在形成中,因此最为重要的分裂“并非存在于南北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劳工和高度集中的资本及其所支配的政府之间”。<sup>③</sup>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导致世界加速分化为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劳工阶级”,全球资产阶级日益成为“追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级

① André Gorz, *Strategy for Labou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pp.17-26. 亦可参见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Boston: Southend Press, 1982.

②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③ Jay Mazur, "Labor's New Inter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 2000, p.92.

事业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而全球劳工阶级则日益成为一个自在阶级，这就为劳工国际主义提供了客观基础。<sup>①</sup>然而，秉持谨慎立场的研究者则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给劳工阶级以及它们的反抗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远未到谈论世界劳工阶级形成的时候，南北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是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最大障碍，与其说世界各国的劳工阶级正在反抗共同的跨国资产阶级，倒不如说它们正在为了争夺资本主义秩序下的利益而进行激烈的相互竞争。<sup>②</sup>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劳工阶级以及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因此需要我们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理解这一过程。如果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视野来审视劳工阶级及其反抗运动，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提供了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可能性，又制造了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所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本文以劳工阶级为何难以实现国际团结作为问题意识，以现代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劳工阶级的基本视野。由此本文形成的基本答案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产生了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并未削弱反而强化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正是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及其运作过程将劳工阶级限制在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劳工阶级更多地成了民族国家的一分子，而非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民族国家构成了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最大政治障碍。

本文以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为基本线索，致力于揭示民族国家整合劳工阶级从而阻碍劳工阶级形成国际团结的主要逻辑。首先，现代世界体系虽然在劳动分工过程将劳工阶级塑造到相近的位置上，也就是劳动力市场上赚取工资性收入的雇佣劳动者，但是现代世界体系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其次，民族国家的形成将劳工阶级分散到相互分割的政治地理空间之中，不仅民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会加深劳工阶级的国别差异，而且民族国家的统治策略也会促使劳工阶级积极向民族国家靠拢，从而与民族国家整合在一起。再次，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劳动力商品化的压力和民族国家在劳工阶级内部制造的裂痕，促使劳工阶级不得不主动远离国际团结转而进行界限划分，否则就不可能适应现代世界体系。最后，现代世界体系的维系恰是以劳工阶级的分裂为前提的，所以劳工阶级要想走向国际团结，也必须以现代世界体系的改变作为基本条件。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以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作为分析对

① William Robinson and Jerry Harris, "Towards a Global Ruling Class?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Science and Society*, Vol.64, No.1, 2000, pp.11-54.

② Beverly Silver and Giovanni Arrighi, "Workers North and South,"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1*, London: Merlin Press, 2000, pp.53-72.



象,虽然强调了民族国家对于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阻碍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劳工阶级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工阶级与资本之间的冲突,恰是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的根源所在。<sup>①</sup>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看,劳工阶级对资本的反抗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重要动力,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又在新投资地制造新的劳工阶级反抗。所以,劳工阶级对资本剥削的反抗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是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基础,本文正是以此为前提进而论述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只不过,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如何消解了根源于劳工阶级与资本之间冲突的国际团结进程。

## 二 想象的政治现实与现实的政治想象

国际团结与民族国家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想象的政治现实和现实的政治想象。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确有着推动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趋势,因为它所制造的雇佣劳动者身份包含着很大的同质性,故而构成了劳工阶级达成国际团结的朴素基础。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同样塑造了民族国家,正是民族国家构成了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最大障碍,因为民族国家相对于国际团结而言是更为现实、强大的组织化力量。

### (一) 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想象的政治现实

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就是指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劳工阶级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形成了联合行动,国际团结以阶级身份为动员基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为共同敌人、以劳工阶级解放为核心目标。里奥·帕尼特(Leo Panitch)强调指出,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是一个超越劳工阶级多样性而非漠视或者消除多样性的过程,这就意味着通过包容性策略而非压制多样性的策略来锻造整体的目标,并且要从中获得力量”。<sup>②</sup>安琪·霍格威特(Ankie Hoogvelt)认为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首要的含义就在于,民族国家对于劳工阶级而言从地理因素转化为社会关系,于是劳工阶级就从限制它的各种历史的、地缘政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sup>③</sup>不言而喻,劳工阶级要想达成国际团结,既

<sup>①</sup> 马克思认为工人没有祖国,因为现代国家无非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根源于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维持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必然要求在现代国家中占据统治阶级地位,所以现代国家提供了它压迫和剥削劳工阶级的关键支撑。马克思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有集中的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1—307页。

<sup>②</sup> Leo Panitch, "Reflections on Strategy for Labour," p.370.

<sup>③</sup> Ankie Hoogvelt,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5.

要克服劳工阶级内部的多样性,又要突破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及其运作过程的限制。如果劳工阶级实现了国际团结,那么劳工阶级就不再是自发阶级而是凝结为一个整体的自为阶级。

处在多种限制因素之中的劳工阶级如何才能实现国际团结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提出了劳工阶级终将走向国际团结的议题,又从理论上阐述了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动力机制。首先,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从生产和消费上将世界连为一体,这是劳工阶级实现国际团结的时代背景。要言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①</sup>其次,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压力将劳工阶级驱使到了同质化的轨道之上,“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sup>②</sup>再次,劳工阶级同质化的发展,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因为同质化提供了共同的阶级觉悟生长的土壤,也提供了阶级觉悟能够蔓延的“类似于传染病广泛传播的环境”。<sup>③</sup>最后,资本主义剥削在劳工阶级的生活世界中成为最重要的事实,“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是法国,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sup>④</sup>于是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即将破茧而出。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工人阶级的力量将变得日益强大、斗争策略也将日益成熟,这是工人阶级走向国际团结进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性因素。<sup>⑤</sup>重要的问题在于,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并不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自动到来,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从来就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并且也是同样重要的,劳工阶级的日益强大和成熟不是指同质化的劳动力大军在规模上的迅速膨胀,而是指劳动力大军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有效地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无疑是理解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最重要的政治维度。<sup>⑥</sup>劳工阶级为了同资产阶级进行对抗只能依靠组织起来所形成的集体力量,但是劳工阶级的组织时常遭到破坏。由于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的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1页。

③ David Gordon,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26.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3页。

⑤ 保罗·斯威齐著,陈观烈、秦亚男译:《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7页。

⑥ Stuart Hall, “The ‘Political’ and the ‘Economic’ in Marx’s Theory of Classes,” in Alan Hunt, ed., *Class & Class Structur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pp.19–28.

达以及阶级觉悟的形成和传播,劳工阶级得以在更大范围内组织起来,于是将地方性的反抗运动汇合成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将全国性的反抗运动联合成国际性的反抗运动,成为阶级性质的对抗。劳工阶级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在此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共产党“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而且在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各个发展阶段,“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sup>①</sup>

马克思关于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论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迎来了验证的时刻。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功地使集体性的气质成为工人生活中的一项中心要素。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历史研究发现,“当年的工人运动及党派,之所以能够打动工人阶级的内心,其中力量就在于工人中间的一个普遍的信念:像他们这样的人,如要改变命运,个人无能为力,只有靠集体的行动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体方式,便是通过组织,不论是经由相互救济的手段,还是罢工、投票均可。反之,他们也相信,正因为劳动工人数字的庞大及情况的特殊,集体行动便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掌握的方式”。<sup>②</sup> 当时主要工业国家的劳工阶级的力量都得到了巨大发展,英国的“新工联主义”打破了产业、地域的局限,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联合在一起,劳工组织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和政治性。<sup>③</sup> 法国呈现出“社会主义组织大爆发”的状态,劳工阶级“共同融入了一场阶级觉醒的运动”。<sup>④</sup> 劳工阶级反抗运动向来不活跃的美国此时也进入了反抗运动的高潮时期,几乎所有大工厂的工人都参与了反抗运动,并争取到了非工会劳工的广泛支持。<sup>⑤</sup>

即便如此,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仍然没有突破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未能最终实现,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者都陷入了分裂的境地。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在回顾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前夜的那段历史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将劳工阶级推到了民族国家的怀抱,于是劳工阶级的国际主义“不光彩地失败了”。<sup>⑥</sup> 在民族国家压倒了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5页。

②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郑明萱译:《极端的年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页。

③ 迈克尔·曼著,陈海宏等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664页。

④ William Sewell, "Artisans,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sitide Zolberg, ed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70.

⑤ Martin Shefter,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sitide Zolberg, ed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17-218.

⑥ Edward Carr, *Nationalism and After*, London: Macmillan, 1945, pp.20-21.转引自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第15页。



对于劳工阶级来说,转化成“在一种不利于革命的情势下提供了革命的前景,在一个没有内在革命传统的国家提出了一种革命理论”。<sup>①</sup> 毋庸讳言,劳工阶级争取国际团结的失败遭遇证明国际团结只是一种想象的现实,尽管这种想象建立在资本主义扩张和劳工阶级力量不断增大的基础上,但是当国际团结的进程撞击到民族国家这种障碍时就不得不戛然而止,只有当劳工阶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及其运作过程的限制时,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才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正是有鉴于此才将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预约在未来。

## (二) 民族国家:现实的政治想象

民族国家即现代国家,它是由组织、制度、规则等要素组成的现代政治共同体的物质外壳。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争夺强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垄断控制权的历史进程,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看来,民族国家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它是中央集权的,并控制着连续的且界定清楚的疆域、实现了对强制手段的控制、同其他组织相分离并且高于这些组织。<sup>②</sup> 民族国家将统治的基础直接建立在国民的基础上,于是国民的生活也“前所未有地依赖于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在内部推行国家语言、国家教育、国家军事服务,在外部控制跨越国家的运动,“运用关税和海关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把外国人看成需要限制权利和严密监视的与众不同的人”,于是集大成的结果就是“生活在国家内同质化了,在国家之间异质化了”。<sup>③</sup> 民族国家是直接统治国民的,因此它深深地嵌入了包括劳工阶级在内的广大国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可以说民族国家是劳工阶级必须直接面对的生活现实。

当劳工阶级启动国际团结的制造工程之前,民族国家在欧美世界已经形成了,因此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制造工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进行的。根据斯坦因·罗坎(Stein Rokkan)的观察,现代西方社会先后出现了四种分裂趋势,即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之争、国家与教会之争、旧的土地所有制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之争、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争。<sup>④</sup> 民族国家在经历了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之争、国家与教会之争以后就基本成熟了,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出现得最晚,因而不能不受到

<sup>①</sup> Mary Nolan, “Economic Crisis, State Policy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Germany 1870–1900,” in Ira Katznelson and Aritotle Zolberg, 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p.389.

<sup>②</sup>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7.

<sup>③</sup> 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127—128 页。

<sup>④</sup> Stein Rokkan, *Citizen, Elections, Par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0, pp.102–113.

之前出现的分裂及其结果的影响,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影响。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主要是军国主义的,因此在工人阶级出现以前,现代国家定型于‘代议制’、‘民族’和‘军事—文职’的问题上。然而,整个西方资本家和工人反应都相似,在生产领域有相似的变化,工人政治在相当程度上受这些定型的影响”。<sup>①</sup> 民族国家相对于劳工阶级而言的先存性,不仅意味着劳工阶级从一开始就同民族国家纠缠在一起,而且意味着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必须充当民族国家的替代物,否则就不能给劳工阶级提供一种新的发展前景。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国家就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是在本质上有局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首先,它是想象的,因为规模最小的民族国家的成员也难以认识自己绝大多数的同胞,但是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国民的心中。其次,它是有限的,因为规模达至十亿的民族国家也有着确定的边界。再次,它拥有主权,因为民族国家兴起之时人类社会也迈进了一个通过主权从而实现民族自由的新时代。最后,它是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国家内部可能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国民之间的关系仍然被视为有着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友爱。<sup>②</sup> 尽管民族国家是基于想象而结成的政治共同体,但是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一整套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扮演着社会生活建构者的角色,并且这套制度体系将在建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因此不断拓展的制度性基础构成了民族国家最显著的特征。<sup>③</sup>

作为由制度体系打造的“现实的政治想象”,民族国家也在应对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过程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它竭力使用公民身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公民权利来整合劳工阶级,从而在争取劳工阶级的政治忠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指出,“民族国家是公民权利的源泉”,民族国家的核心内容就是将权利与义务授予所有成年人,从而将他们界定为“公民”。<sup>④</sup> 公民权利来源于民族国家的背后,实际上是在说公民权利来源于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地理范围的,因此人民主权与民族国家的结合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与此同时,人民虽然是由公民组成的整体概念,但是当人民主权孕育出公民权利时,个人主义就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在争取公民权利,并且劳工阶级的阶级觉悟正是以公民权利作为生长基础的,因此民族主义和

①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第696页。

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叻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7页。

③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第105页。

④ 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 Citizenship*,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p.122.

个人主义在劳工阶级的观念世界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汤姆·奈林(Tom Nairn)在讨论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时认为,“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sup>①</sup> 其实,奈林的观点无非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而已,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成功破坏了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进程,主要工业国家的劳工阶级纷纷追随自己所在的民族国家参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道。霍布斯鲍姆写道:“接受战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的表现并不是很热衷。他们之所以接受战争,主要是因为害怕被追随者遗弃;他们的追随者,在自发热忱的激励之下,踊跃从军。在没有征兵制的英国,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间,共有200万人志愿服役。这个事实,以令人悲伤的方式证明了整合式民主运动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几乎尚未认真着手使贫穷公民认同于国家的地方,或者在几乎无法使贫穷公民与国家政府产生认同的地方,民众才会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反战。”<sup>②</sup>由此观之,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及其运作过程有效地制造了劳工阶级的民族国家认同,这样的认同迫使劳工阶级的组织都从国际团结的立场退缩到民族国家的立场。

马克思在做出劳工阶级最终将走向国际团结的理论判断时,就清醒地意识到民族国家将对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产生极大的破坏,“工人没有祖国”这样的政治宣言,不仅是对劳工阶级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的现状的严厉批判,而且也是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基本方略,因此他将民族国家视为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过程中必须要克服的最大障碍。而当马克思将研究的眼光直视现代民族国家时,他发现民族国家是“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网罗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并且社会发起的“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sup>③</sup> 出于对民族国家在控制社会方面具有的强大力量的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认为劳工阶级不仅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而且要在夺取民族国家政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彻底打碎国家政权,否则也不可能实现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即使暂时实现了也会被国家政权分割为民族主义。

列宁将劳工阶级实现国际团结的革命逻辑概括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sup>④</sup> 但是,当国家政权占据了劳工阶级社会革命的中心位置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同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逻辑暗合在一起。这种暗合集中

① 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Common Ground Pub, 2003, p.329.

②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2页。

④ 《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体现在劳工阶级要集中力量打碎民族国家的政权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民族国家对劳工阶级的整合程度越深,劳工阶级越是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即使当劳工阶级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开展联合革命行动时,劳工阶级的革命“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sup>①</sup>所以劳工阶级的阶级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就处于相互混杂的胶着状态。如果说劳工阶级的社会革命是笼罩在民族国家头上的“幽灵”,那么同样可以认为民族国家是笼罩在劳工阶级头上的“幽灵”。

### 三 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逻辑

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前景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基础之上的。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不断地被制造出来,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劳工阶级由于处在共同的劳动力市场中而逐渐同质化,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会逐渐孕育出阶级意识,最终劳工阶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进而形成国际团结。然而,作为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最大障碍的民族国家,同样也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劳工阶级的同时也将它们分散到不断成熟的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且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引发了民族国家之间持续的相互竞争,进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国家对其疆域范围进行集中控制的能力,因此民族国家对于劳工阶级而言是越来越强大的政治障碍。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不只是制造了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而是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所以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进程以及民族国家对此进程的破坏,都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发生的。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最大障碍,那么现代世界体系则是民族国家能够发挥此种破坏作用的结构条件,这就是说现代世界体系才是导致劳工阶级难以达成国际团结的根源所在。现代世界体系根据劳动的国际分工而将民族国家置于一种等级性的结构体系之上,民族国家为了在等级性的结构体系中获得优势地位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乃至暴力对抗,因此民族国家的力量得到了增强,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扩张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强化。尽管民族国家为了争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而竭力提升本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位置,但是优势地位恰是以差异性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民族国家的竞争只会强化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及其对劳工阶级的分化作用。概而论之,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不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3—284页。

仅以政治地理的方式分割劳工阶级,还以强化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方式分化劳工阶级,这正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逻辑所在。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产物。就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而言,它是建立在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世界经济体,所谓融入世界经济体意味着“至少某些重要的生产过程,变成了构成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劳动分工的各种商品链条的组成部分”,现代世界体系发源于16世纪的欧洲,由于内部压力的推动而持续地向全世界扩张,最终使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先后融入其中。<sup>①</sup>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具有与其他世界体系不同的特点:“它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因为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事实上,它的范围(很难说边界)囊括了帝国、城邦和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世界’体系,并非由于它囊括了整个世界,而是由于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它还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终于(我们将会见到)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sup>②</sup>

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特点所做的概括清楚地说明,现代世界体系虽然只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而非政治体系,但是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有着重要的政治内容,这就是同世界经济体系相契合的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他进而指出现代世界体系有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内,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sup>③</sup>这里所说的国家结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的扩张而发展成熟,并且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也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sup>④</sup>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孙立田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③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194页。

④ Immanuel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 History and Dilemmas,” in Samir Amin, Giovanni Arrighi, Andre Frank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Transforming the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World-Syste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p.14.



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是世界经济体的基本支柱,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体的扩张实际上就是将国家内部的劳动分工提高到全球层面上,从而使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发达的体系出现。在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看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建立,无非是资本的“空间调整(spatial fix)”策略。<sup>①</sup>借助资本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廉价且充沛的劳动力大军得以与资本结合,资本输出地区的劳工阶级的力量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工阶级的竞争而被削弱了。在廉价的劳动力十分充足且容易获得的条件下,资本只要善于利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就能获得大量的生产剩余,而无须通过将自身过多地转化为技术装备以获得竞争优势,进而维持比较高的利润率水平。换言之,资本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低端地带的弹性积累,能够有效解决资本输出地存在的过度积累问题。<sup>②</sup>

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劳工阶级,但是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内部的差异性最终也要体现在劳工阶级身上。对于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的劳工阶级而言,必须正视的重要方面在于,“一个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是决定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相对力量的主要因素”。<sup>③</sup>这就是说,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阶级结构以及劳工阶级。越是处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低端的劳工阶级,由于它们规模巨大且容易获得,故而越是受到劳动力市场规则的支配,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体边缘地带乃至半边缘地带的劳工阶级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当廉价的商品以及劳动力大规模地流入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地区时,中心地区的劳工阶级尽管处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高端位置,它们的就业安全与社会福利也将由于竞争压力的增大而遭受损害。因此,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一个统一的劳工阶级,相反,它对劳工阶级造成了巨大的分化效应,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劳工命运共同体的出现,仍然前路甚远,充满不确定的挑战”。<sup>④</sup>

民族国家从形成到成熟的过程,是同世界经济体的扩张过程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就像世界经济体随着时间不断扩展一样,世界经济体的政治表现形式——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也是一直扩展的”。<sup>⑤</sup>民族国家最先形成于现代世界体系的

① 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315.

② 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 a Critical Geography*, p.359.

③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69.

④ Margaret Levi and David Olson, “The Battles of Seattle,”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28, No.3, 2000, p.313.

⑤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

中心地区即西欧,虽然政治权力及其组织结构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早期阶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然而事实上,不管曲线怎样浮动,我们面前看到的却是在整个现代时期国家权力持续增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看来需要并促进了这一增强中央集权与国内控制的长过程,至少在中心国家是这样”。<sup>①</sup> 当世界经济体越出欧洲地区从而将全世界囊括进来时,民族国家就逐渐成为世界上其他政治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必然意味着政治结构嵌入国际体系之中。这也意味着,这些已经在这些地区存在的国家,或者把它们自己转变为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或者被已采取了这种方式的新政治机构取代;或者被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吞并。”<sup>②</sup> 世界各个地区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嵌入国际体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依托主权从而对世界经济体进行分割,并且要在分割的基础上开展竞争。

民族国家在西欧地区一经形成,就作为支撑西欧向全世界扩张的关键力量而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走向殖民帝国的过程时写道: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关税保护制度构成了英国扩张的制度基础,而所有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够为英国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开辟道路,基本的原因在于这些制度“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sup>③</sup> 当世界各地纷纷建立了民族国家时,民族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激烈的竞争,而国家之间的竞争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国家本身的重要性,这就促使民族国家追求更大的力量和地位。无怪乎,自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各国的统治者都专注于以两种方式增强国家的实力:提高国家的权威,即它在国家边界内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提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即将其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减少相反情况发生可能性的能力”。<sup>④</sup> 历史经验也表明,世界经济体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国家往往是最早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巩固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位置的根本政治保障。

由于民族国家成了政治共同体的普遍的组织形式,而且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被现代世界体系不断强化,因此民族国家与国际劳动分工就更加紧密地交融在一起。国际劳动分工从经济维度将世界经济体区分为中心地带、半边缘地带以及边缘地带,中心地带由于占据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故而能够持续不断地从半边缘地带和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175—176页。

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第219页。

③ 《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页。

④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吴英译:《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

边缘地带汲取生产剩余。当国际劳动分工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时,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也就相应转化为核心国家、半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sup>①</sup>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实质上就是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半核心国家以及边缘国家的等级性结构体系,核心国家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保障中心地区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剩余的提取,从而持续不断地巩固它们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所以沃勒斯坦将“国家的现代史看作是一种长期的追求,以建立强大的国家机构来保护世界经济体中的一些所有者—生产者的利益,反对另外一些所有者—生产者,当然还反对工人”。<sup>②</sup>

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半核心国家以及边缘国家的等级性结构体系并非不可改变,事实上这种等级性结构体系赋予了民族国家改变自身地位的强大动力,于是民族国家纷纷加入经济竞争的潮流,期望通过提升它们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来改变它们在等级性结构体系中的角色,也就是能够从边缘国家上升到半核心国家、从半核心国家上升到核心国家,或者能够持续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核心国家地位。必须强调说明的是,无论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改变,还是民族国家在等级性结构体系中的角色改变,民族国家之间进行的激烈竞争都不可能改变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也不可能改变民族国家这种由世界经济体推动形成的现代政治框架,同样不可能改变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的等级性结构。因为世界经济体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地区是世界经济体存在下去的条件,“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确保剩余产品流入西欧以保障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sup>③</sup>只有当世界经济体存在的前提下,民族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提升和国际体系中的角色改变,才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民族国家通过竞争追求改变的行为将会进一步强化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等级性结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致使很多研究者重新认识民族国家的地位,他们甚至认为跨国公司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削弱,现代世界体系强化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被悄然改变了。其实,“跨国公司只不过是资本充分使用资本积累机会的努力的全新组织形式而已,它要打破劳工阶级的胜利所施加给资本的约束”,因此跨国公司不仅会进一步强化差异性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而且要借重民族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463页。

②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第129页。

③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99页。

国家的力量。<sup>①</sup> 跨国资本在推动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大规模的人口进入沿海地区的出口工业城市转化为劳工阶级时,虽然劳资冲突不断积累以致发生了激烈的劳工反抗,然而劳工阶级的反抗很少能够取得成功,基本的原因就是民族国家推行的统合主义压制了劳工阶级的组织能力与集体力量,这就为跨国资本创造了有利的工业环境。<sup>②</sup>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正确地指出:“跨国公司的巨大规模、市场实力和执行的全球战略使许多群体和国家担忧自己将屈从于跨国公司生产和服务的全球化,遭受跨国公司的剥削。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跨国公司的确代表了经济权力、通常还有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sup>③</sup>但是如若据此就认定跨国公司将对民族国家产生重大威胁则大错特错了,因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并且“各国的政治雄心和角逐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它们在合作方面的努力,确立了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sup>④</sup> 因此,民族国家依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的首要行动者,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依然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民族国家对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分化劳工阶级的效应所具有的强化作用丝毫未有改变。

#### 四 民族国家的统治策略

民族国家是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最大障碍,不仅是因为现代世界体系强化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劳工阶级按照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分割成不同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民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相互配合的统治策略,使劳工阶级紧密地同民族国家交融在一起。概括而论,民族国家针对劳工阶级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系统地推行了赋予劳工阶级以政治权利、区别对待劳工阶级、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塑造民族认同、重塑劳资冲突的政治生态等统治策略。

民族国家的统治策略并非各自为政,事实上它们由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协调,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使劳工阶级以民族国家公民的身份进入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和统治

① Charles Bergquist, “Placing Labor at the Center,” in Charles Bergquist, ed., *Labor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0-11.

② Frederic C. Deyo,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209-211.

③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271 页。

④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第 17 页。

轨道,进而使劳工阶级从挑战民族国家的力量转化成为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民族国家的统治策略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劳工阶级相信它们的利益同民族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是劳工阶级实现利益的政治保障,劳工阶级的国家认同得到了强化,而阶级认同则被削弱了。甚至可以说,民族国家的统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同盟,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引发了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盟变得更加紧密。

### (一) 赋予劳工阶级以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是民族国家整合劳工阶级的枢纽所在,也是民族国家的其他统治策略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基础。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劳工阶级被民族国家排斥在享有政治权利的群体范围之外,对劳工阶级的政治排斥实际上赋予劳工阶级共同的政治地位,并且促进劳工阶级同民族国家形成对立关系,从而走上革命道路。阿瑞吉指出,民族国家在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中始终占据了中心位置,民族国家对劳工阶级争取政治权利运动的压制,使民族国家面临着劳工阶级革命的巨大威胁。<sup>①</sup> 霍布斯鲍姆在总结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围绕政治权利进行斗争的历史时写道:“其人数因工业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显著增加,其出现越来越不可避免,其阶级意识似乎会直接威胁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阶级便是无产阶级。”<sup>②</sup>在统治秩序不断受到挑战和承受越来越大的革命压力的情况下,民族国家通过赋予劳工阶级政治权利,从而同劳工阶级实现了历史性的妥协。

劳工阶级获得的政治权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选举权,另一个是工业公民权。劳工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公民身份瓦解劳工阶级的阶级身份的开端,选举权意味着劳工作为公民,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的基本单位,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政治过程中,劳工的利益如同其他公民的利益一样得到了尊重和考虑,因此劳工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劳工的利益同样能够通过这个过程得以实现。工业公民权就是劳工集体权利,主要是指劳工阶级以集体的形式进行罢工、结社、谈判的权利。工业公民权实际上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向生产领域的延伸,民族国家对工业公民权的承认表明劳资关系领域并非是在外在于民族国家应负政治责任的领域,民族国家借助工业公民权限制了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专断权力,从而成功地在劳资关系中建构了以集体谈判为主体,由工会组织以及申诉制度与之相配合的“内部国家”或者说“生产政体”。<sup>③</sup> 民族国

<sup>①</sup> Giovanni Arrighi, "Marxist Century-American Centur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p.63.

<sup>②</sup>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第127页。

<sup>③</sup>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85, pp.7-8.



家借助工业公民权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将劳工阶级限制在了生产领域之中,并且诱使劳工阶级走上追逐物质利益的个人主义道路,而劳工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将进一步激发劳工阶级内部的冲突,从而起到了掩盖和分散劳资之间阶级冲突的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工业国家纷纷落实劳工阶级的政治权利,从而为民族国家整合劳工阶级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 (二) 区别对待劳工阶级

虽然劳工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利,但是这绝非意味着在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它们能够得到民族国家的平等对待,相反,民族国家总是利用劳工阶级内部的差异对劳工阶级区别对待。由于种族、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劳工阶级内部本来就存在着分裂,而且伴随着福特主义生产体系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的系统性重构,劳工阶级内部的分裂更进一步被“绝妙安排的分割和异化技术”巩固和强化了。<sup>①</sup> 当民族国家需要对劳工阶级区别对待时,民族国家只需要对劳工阶级内部事实上已经明显存在的差异善加利用,就能够有效地实现目的。民族国家在劳工阶级内部分裂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了两种区别对待策略:一种是对本国劳工和外国劳工进行区别对待;另外一种则是将本国劳工划分为核心工人与边缘工人进而区别对待。

民族国家区别对待本国劳工阶级与外国劳工阶级不仅指将流入本国的外国劳工阶级推向劳动力市场的不利位置,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为本国劳工阶级提供比较优越的物质条件,同时将成本转移到核心国家之外的劳工阶级身上。核心国家的劳工阶级所获得的比较优越的物质条件是资产阶级让渡出来的一部分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实际上是由非核心国家的劳工阶级所创造却被核心国家攫取的,故而非核心国家的劳工阶级承受更加严重的剥削是核心国家与其劳工阶级之间妥协形成和维持的关键条件。如果非核心国家的劳工阶级要求得到和核心国家的劳工阶级同样的物质条件,那么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不可能维持利润率水平从而实现资本积累,这将引发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sup>②</sup>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兴盛以后,欧美国家纷纷对过去建立的社会保障网进行不同程度的拆除,试图重新将劳工阶级置于市场力量的完全支配之下,于是区别对待不同国家的劳工阶级的策略也被复制到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国家为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稀缺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劳工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使他们成为受到社

<sup>①</sup> Michael Torigan, "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41, No.2, 1999, p.336.

<sup>②</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Response: Declining States, Declining Right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Vol.47, 1995, pp.24-27.

会保障网保护的核心工人,与此同时,民族国家有意或者无意地放任劳动力市场的法则对其他劳工的支配,将这些劳工变成社会保护网之外的边缘工人。其实,边缘工人往往是核心工人的家庭成员,尤其可能是核心工人的妻子和女儿。<sup>①</sup> 由于核心工人得到了民族国家推行的区别政策的保护,如果非核心工人采取反对区别政策的反抗运动,她们的边缘地位所具有的力量不仅决定了反抗运动的失败,而且会影响处在核心工人地位的家庭成员的利益,所以尽管非核心工人承受巨大的不公正,非核心工人还是会倾向于默认或与民族国家的区别政策合作。<sup>②</sup> 由此可见,区别对待劳工阶级的策略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和民族国家内强化了劳工阶级的分裂,而且在民族国家的层面制造了劳工阶级对民族国家的屈从甚至依附。

### (三) 建立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质内容是公民的社会与经济权利,它是劳工阶级在政治权利的基础上积极争取社会与经济权利的后果,民族国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是同区别对待劳工阶级的策略密切相连、相互配合的。劳工阶级作为无差别商品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为了工作机会而激烈竞争,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资产阶级对于雇佣劳动的需求,但是如果任由市场竞争法则支配劳工阶级,最终将导致劳工阶级掀起自我保护的反抗运动,而且劳工阶级会同其他同样遭受市场竞争法则损害的社会集团联合起来行动,此时民族国家就不得不开始执行各种社会保障政策,以保护公民不受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过分侵害。<sup>③</sup> 劳工阶级既是反对过度市场化的主干力量,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受益者。由于得到了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基本生活所需,劳工阶级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挤进劳动力市场,将自己作为商品进行售卖,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间实现了相对分离,劳工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商品化。<sup>④</sup>

社会福利制度标志着民族国家对劳工阶级的重大利益让步,集中反映了劳工阶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盟,它迫使资产阶级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改善劳工阶级的物质条件。然而,社会福利制度对劳工阶级的影响远非如此简单。福利当然意味着利益分配向劳工阶级的倾斜,但是福利制度并未触动既定的阶级体系,它的建立更多的是起到了承认、维护和再生产既定的阶级体系的作用。<sup>⑤</sup> 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避免劳工阶

① 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第90页。

② 汪仕凯:《全球劳工治理:议题、机制与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78页。

③ 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351页。

④ Michael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pp.125-126.

⑤ 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著,苗正民、滕玉英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7—78页。

级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使“全世界受苦的人”分化为劳工阶级与赤贫者;另一方面促使资产阶级为劳工阶级的体面生活承担责任,从而在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制造了一种利益连带关系,赋予两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妥协更多的政治想象空间。<sup>①</sup> 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指出,福利制度制造了作为工人而存在的生产领域与作为公民而存在的政治领域相互分离的假象,并且“这种社会、政治世界的划分模糊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和功能联系,因此也阻碍了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的政治观的形成”。<sup>②</sup> 换言之,劳工阶级已经不可能形成阶级意识,走向国际团结,从而充当推动革命性变革的主导力量了。

#### (四) 塑造民族国家认同

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是民族国家在劳工阶级之中塑造民族认同的现实基础。劳工阶级民族国家的认同,就是指劳工个人相信自身通过公民身份这个中介因素而同民族国家融合在一起,或者说公民身份意味着真实的利益,因而获得了公民身份的劳工相信自己就是民族国家的一分子。霍布斯鲍姆指出:“在一个越来越民主的时代,政府官员不能再依靠传统社会阶级较低的人服从阶级较高的人的稳定秩序,也不能再依靠传统宗教来确保社会服从。他们需要一个团结国民的办法,以防止颠覆和异议。‘民族’是各个国家的新公民宗教。它提供了使所有公民附着于国家的粘合剂,提供了将民族国家直接带到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方法,并可平衡人们对那些‘超越政府的事物’(如宗教、与国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种,或更突出的阶级)的效忠。”<sup>③</sup> 民族国家认同的塑造必须以公民权利的扩展为前提,因为公民权利是民族国家认同这种公民宗教的政治象征。

民族国家的认同塑造最终成功地使民族国家成为劳工阶级的政治忠诚的归宿所在。民族国家认同是一种流动在观念世界中的社会粘合剂,它使民族国家的政治界限内化为劳工阶级的基本利益。正如迈克尔·曼所分析的那样,“美国的工人与墨西哥的工人在原则上都可以被看作是跨民族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美国的工人由于国籍而有着更高的优势地位,他们把国籍看作比他们自己任何的阶级团结都更重要得多,实际上,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高于墨西哥人,而且是以一种准阶级关系来剥削他们”。<sup>④</sup> 由此可

<sup>①</sup> Daniel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21-225.

<sup>②</sup> 克劳斯·奥菲著,郭忠华译:《福利国家的矛盾》,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sup>③</sup>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第167页。

<sup>④</sup> 迈克尔·曼著,郭台辉、茅根红、余宜斌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5页。

见,民族国家造成的劳工阶级的分裂,从根本上损害了劳工阶级的利益。但因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界限为不同国家的劳工阶级实际得到的利益提供了保障,所以对于劳工阶级来说,忠于自身所属的民族国家就是忠于自己的利益。在阿里斯蒂德·佐尔伯格(Aristide Zolberg)看来,劳工阶级纷纷认同民族国家标志着劳工阶级走向了消亡,而极少数坚持国际主义的劳工则是“面临灭绝的残余物种”。<sup>①</sup>

### (五) 重构劳资冲突的政治生态

劳资冲突的政治生态是指社会各界对于劳资冲突的整体认知、价值判断、话语环境等。劳工阶级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反抗,虽然最终没有达成国际团结和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劳工阶级仍然迫使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向劳工阶级做出了重要的利益让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胜利使劳工阶级相信它们有着强大的力量,相信它们的力量能够改变现状从而争取到更多的利益,相信它们的力量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以劳工阶级的强大力量和信念为基础,欧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开始形成了有利于劳工阶级的劳资冲突的政治生态。但是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主导欧美国家的政策取向,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继而在20世纪90年代兴盛起来,并且对世界各国的公共政策与外交政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民族国家开始对劳资冲突的政治生态进行重构。工人对“他们力量的信念”本身就是劳工阶级力量的重要来源,而民族国家对劳资冲突的政治生态的重构,就是要削弱“这个维系了一个世纪的对工人力量的信念”,并且瓦解劳工阶级为改变现状而进行斗争的政治意愿和话语环境。<sup>②</sup>

民族国家对有利于劳工阶级的劳资冲突的政治生态的重构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同时进行:一个层面是灌输劳工阶级只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念;另一个层面则是强调全球化对于劳工阶级既得利益的损害,推卸民族国家在此过程应该承担的责任。劳工阶级是以代表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在社会认为劳工阶级只是代表自身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如果劳工阶级对民族国家的政策转向损害它们的利益而进行抗争,那么劳工阶级就站到了社会的对立面,因此劳工阶级的力量及其使用就被限制住了。<sup>③</sup>而强调全球化所具有的损害劳工阶级利益的效果,实际上也是为

<sup>①</sup> Aristide Zolberg, "Response: Working-Class Dissolu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Vol.47, 1995, p.28.

<sup>②</sup> Frances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Power Repertoires and Globaliza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28, No.3, 2000, pp.413-414.

<sup>③</sup> David Gordon, *Fat and Mean: The Corporate Squeeze of Working Americans and the Myth of Managerial "Downsizing"*, New York: Martin Kessler Books, 1996, pp.200-203.

了给民族国家推行的削弱劳工阶级利益的政策制造了一个“别无选择”（撒切尔语）的挡箭牌，其用意就在于迫使劳工阶级接受新的政策，并且要让劳工阶级相信这些政策是在顺应全球化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民族国家无力驾驭狂飙突进的新全球化浪潮，从而像过去那样借助政策为劳工阶级提供社会安全网。

不难发现，民族国家对劳资冲突政治生态的重构有着明显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重构过程所贯穿的理念是，全球化不可避免，市场代表着普遍的利益，因此，劳工阶级利益在此过程中受损的原因，就在于劳工阶级缺乏有效满足全球化市场需要的技能。在劳工阶级利益问题上，民族国家的责任小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市场竞争，而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责任又小于劳工阶级本身，这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基本政策导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工阶级反抗运动的兴起，各个民族国家的劳工阶级之间的分裂，劳工阶级反抗运动同其他新社会运动的交叉、融合，都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民族国家内外政策的塑造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事实上，民族国家至少是欧美国家不可能受全球化摆布，它们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推手和获益者。欧美国家从来“没有失去对于贸易、资金流动、征税的监管权力”，一旦存在维护利益的需要，欧美国家就会动用国家主权，“有意识地干预市场并代表社会行使某些规则”。<sup>①</sup> 不难发现，民族国家至少是欧美国家并非对于劳工阶级利益受损无能为力，面对全球化竞争时所谓的“别无选择”实质上就是民族国家要充分利用和紧密配合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提供的契机，全面打击劳工阶级的力量以及它们争取到的利益，从而彻底重构劳资冲突的政治生态，最终改变整体上有利于劳工阶级的社会氛围。

## 五 复杂的劳工阶级

世界工人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时为劳工阶级制造的形象，劳工阶级作为劳动力市场上无本质差别的雇佣劳动者，发挥着创造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持续积累的关键作用，这是世界工人形象的现实基础。世界工人实际上意味着劳工阶级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或者同质化的发展趋势。虽然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劳工阶级存在着走向国际团结的发展趋势，但是同时也受到了两个方面现实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在国际劳动分工

<sup>①</sup> William Greider, "It's Time to Ask 'Borderless' Corporations: Which Side Are You On?" *The Nation*, October 26, 2001, pp.5-6.



体系的作用下,劳工阶级被分割到不同的产业部分、技术岗位上,也就是劳动分工体系的不同位置上;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分化作用基础上,有意识地推行了整合和限制劳工阶级的统治策略,从而能够强化和巩固劳工阶级本身的分裂趋势和分散状态,在此过程中,民族国家灵巧地转身,成了劳工阶级利益的政治保障,因此劳工阶级被牢固地限定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

面对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民族国家统治策略的双重制约,劳工阶级的复杂性得到了充分展现。劳工阶级不是单纯视国际主义为根本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劳工阶级能够清楚地发现自己的现实利益所在。当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对劳工阶级进行排斥时,劳工阶级是没有祖国的,资本主义扩张又将劳工阶级推到了激烈的彼此竞争的境地,这个时候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是符合劳工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只有如此才能结成联盟,改变不利于自己的总体局面。但是当民族国家接纳劳工阶级为公民时,劳工阶级的利益就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找到了实现途径,并且由于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大不相同,因而劳工阶级在民族国家中的现实利益也相差悬殊,甚至不同民族国家的劳工阶级在现实利益方面存在明显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劳工阶级必须依靠民族国家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概而论之,放弃国际团结转而拥抱民族国家是劳工阶级面对结构性制约时主动选择的结果。

劳工阶级的主动选择首先体现在它们拒绝阶级身份转而接受非阶级性质的界限或者身份上面。对于资本来说,劳工阶级以个体形式相互竞争最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当工人无论国籍、肤色、年龄、性别如何,都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廉价劳动力时,资本才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增值。但是劳工阶级并不会自愿放弃所有的非阶级性的身份,正如阿瑞吉所言:“每当面对被资本看作一群没有特性而只具备资本增值的不同能力的劳动力时,劳工阶级都在反抗。几乎毫无例外,他们借助或者创造出新的任何可能的显著特征(年龄、性别、肤色和各种地域特征)的结合体,以要求资本对他们区别对待。作为结果,家长制、种族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成为世界劳工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仍然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继续存在于最具有无产阶级特性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之中。”<sup>①</sup>各种非阶级性的身份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属性,它们在多数时候构成了劳工阶级实现国际团结的障碍,但是面对世界市场力量的肆虐时,这些有损于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社会属性却成为一种能够发挥作用的救济手段。

<sup>①</sup> Giovanni Arrighi, “Marxist Century-American Century: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the World Labor Movement,” pp.93-94.

劳工阶级超越各种非阶级性的身份与界限,进而在阶级身份的基础上达成国际团结,唯有如此才能将劳工阶级的数量规模转化为现实的集体力量。劳工阶级也只有凭借这种力量才能最终改变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从而实现劳工阶级的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然而,严重的问题就在于国际团结并不是现实存在的,而是预约在历史的未来某个时刻,甚至连阶级身份也并不是清晰可见的,如果劳工阶级完全放弃非阶级性的身份,那么它们就等于放弃一切可以进行组织动员的资源。而且劳工阶级越是认为国际团结遥不可及,劳工阶级就越是倾向于保存非阶级性的身份以争取现实的利益,“所以工人中总是有一种内在的普遍倾向去划分非阶级性的边界和界限,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陷入灾难漩涡的基础”。<sup>①</sup>当研究者聚精会神地分析劳工阶级如何形成的问题时,劳工阶级中一部分如何积极地建构非阶级性的身份认同以争取现实的利益,与此同时拒绝其他劳工享受同等的社会权利的问题,则被这些研究者长期忽视了,其实各种非阶级性的身份和界限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构成劳工阶级的阶级认同的一部分。<sup>②</sup>

劳工阶级的主动选择还体现在它们接纳的国际团结主张包含着阶级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向非阶级性的身份和社会属性妥协的内容。在劳工阶级形成自为阶级并且在此基础上走向国际团结的历史进程中,各种非阶级性的身份认同、社会界限都不可能完全消失,因而在观念世界里面就不可能为劳工阶级达成国际团结留下宛如一张白纸的空白地带。事实上,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只能在非阶级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边界的基础上形成,并且受到它们生活时代的主流思潮的深刻影响。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在分析典型国家的劳工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经验过程时发现,劳工阶级普遍地接受阶级意识并且围绕着阶级身份团结起来,并不意味着原本就存在于劳工阶级内部的社会裂痕被缝合了,相反,阶级斗争将会进一步深化各种社会裂痕,所不同的是阶级斗争深化社会裂痕的同时也将在特定语境中改变社会裂痕的性质。<sup>③</sup>就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而论,所谓改变社会裂痕的性质就是指要对劳工阶级的非阶级性身份进行改造性利用,从而在劳工阶级的阶级身份和国际团结的基础上,对劳工阶级从非阶级性身份理解的利益进行重新界定,最终使这些利益能够同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协调,也使这些非阶级性的身份成为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构成元素。

① 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第28页。

② Sonya Rose, “Class Formation and the Quintessential Worker,” in John R. Hall, ed., *Reworking Clas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38-139.

③ Stanley Aronowitz, *How Class Wor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39.

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了劳工阶级的复杂性质和劳工阶级的非阶级性的身份与阶级身份之间存在的辩证法。列宁指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现实的经济利益始终主导着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这样的反抗运动只是要求资本家在利益上做出让步、政府颁布必要的劳动保护法律,因此“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意识。<sup>①</sup>在现实利益主导的反抗运动中,劳工阶级的非阶级性的身份和界限就发挥着重要作用,集中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的涌现上,这就是工联主义。而作为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则只能从劳工阶级外面灌输给它们,列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政党才能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以及“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抽象出社会主义意识,然后依靠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教育、宣传工作才能将社会主义灌输给劳工阶级。<sup>②</sup>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意识只能通过嵌入劳工阶级的非阶级性的身份认同之中的方式才能扎下根,当然工人阶级政党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努力就不会有自为的劳工阶级和国际团结。<sup>③</sup>

列宁的分析实际上指向了劳工阶级主动放弃国际团结转而拥抱民族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选择。放弃国际团结而同民族国家妥协和合作,既是劳工阶级自身的主动选择,又是劳工阶级政党的主动选择,而且在劳工阶级充分动员起来纷纷向国际团结靠拢之时,劳工阶级政党在打断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关键影响。工人阶级政党是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所以尽管不同民族国家的劳工阶级受制于非阶级性的身份故而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但是由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同质性,并且借助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联系功能,劳工阶级还是能够达成国际团结。工人阶级政党本来应该发挥引导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关键作用,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工人阶级政党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在20世纪初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包括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普遍相信席卷欧美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逼近,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方面在于,欧洲的劳工运动并没有在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迈上新的高度,北美的劳工运动虽然风起云涌,但始终没有形成有力量的工人阶级政党,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工人

① 《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63页。

③ 汪仕凯:《阶级与公民之间的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290页。

阶级政党放弃了引导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使命。<sup>①</sup> 当世界大战来临时,欧美国家的大多数工人阶级政党发生了分裂,支持本国劳工阶级参与战争从而同其他民族国家的劳工阶级为敌的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民族国家在工人阶级政党的襄助之下成功破坏了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进程,并且民族国家对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破坏事实上得到了劳工阶级的拥护,否则劳工阶级不可能积极参与战争。虽然欧洲一些国家在俄国革命之后纷纷加入第三国际,试图重塑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进程,但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分裂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sup>②</sup>

工人阶级政党放弃引导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使命,转而主动践行拥护民族国家的政治策略,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工人阶级政党被劳工阶级推着走,被迫选择了这样的政治道路,而是在于工人阶级政党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有着重大的现实利益。在民族国家赋予劳工阶级以政治权利之后,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政党也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之后它们也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取得了合法地位。在政治地位得到了法律承认的地方,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和劳工阶级政党都以惊人的速度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到了20世纪初期劳工阶级政党在主要的工业国家已经是政治常态了,如果不存在劳工阶级政党反而是令人吃惊的。劳工阶级政党的发展和劳工阶级队伍的壮大相得益彰,劳工阶级政党趁势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选举势力,虽然在多数国家它们只不过是国会中的少数党,但是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劳工阶级政党已经是国会第一大党,在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劳工阶级政党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进而上台执政的局面。<sup>③</sup>

一些国家劳工阶级政党议会道路的成功为其他劳工阶级政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虽然劳工阶级政党可能现在只是国会中的少数党,但是劳工阶级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只要能够把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劳工阶级,那么劳工阶级政党终将凭借劳工阶级手中的选票成为执政党,从而以合法且和平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劳工阶级政党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的合法地位以及指日可待的上台执政的前景,就成为劳工阶级政党重大的现实利益,正是这样的重大现实利益才促使劳工阶级政党主动选择和民族国家站在一起。一旦劳工阶级政党选择了民族国家,那么它自然也会引导劳工阶级放弃国际团结的主张,转而同民族国家融合在一起。劳工阶级政党主动选择民族国家

① 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Silver, "Labor Movement and Capital Mi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in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harles Bergquist, ed., *Labor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83-214.

②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78—92页。

③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第131—132页。

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陷入选举困境之中,并且选举困境会将劳工阶级政党锁定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之中。

所谓选举困境就是指劳工阶级政党在劳工阶级与全体公民之间左右为难。劳工阶级政党预想劳工阶级规模的壮大将使自己成为执政党,但是劳工阶级规模很少能够达到超过半数选民的程度,这就意味着劳工阶级政党仅凭劳工选民的选票不可能占据执政地位,它必须从其他社会阶级的选民手中赢得支持。如果劳工阶级政党要争取其他社会阶级的支持,那么劳工阶级政党就不能仅仅代表劳工阶级的利益,它必须在选举中放弃以阶级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转而选择以“公民”“人民”等更加广泛性的身份进行政治动员,否则劳工阶级政党就会在选举中失败。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当社会民主党变成‘全民’政党,它们加强了政治是界定‘社会所有成员’集体福利的过程的幻想。政治又一次被以个人—国家的维度界定,而不是被以阶级的维度界定。”<sup>①</sup>对于劳工阶级来说,由于阶级身份已经不再是劳工阶级政党的政治基础,因此劳工阶级政党也失去了独特的吸引力,它们之间的支持关系不再如同过去那样紧密了,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会强化劳工阶级政党的“全民”色彩,促使它们更加彻底地同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

## 六 结论

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对劳工阶级的分化作用得到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及其运作过程的强化,劳工阶级在这些结构性条件的限制下为了争取现实的利益,也主动放弃了国际团结的主张转而选择民族国家作为忠诚的对象,因此,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劳工阶级不可能达成国际团结。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主张其实就是现代世界体系提供的一个想象的政治现实,而真实的政治现实则是现代世界体系必须以劳工阶级的分裂为基本前提条件:一方面,只有当劳工阶级内部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时,它们才能成为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力大军,因而国际劳工分工体系才能维持下去;另一方面,只有当劳工阶级分散在民族国家里面并且同民族国家融合在一起时,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半核心国家、边缘国家的等级性结构才能存在下去。毋庸讳言,正是因为劳工阶级的分裂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前提条件,所以现代世界体系才形成了强化劳工阶级分裂的政治逻辑,从而充当了现代世界体系的自我维持机制。

<sup>①</sup> 亚当·普沃斯基著,丁韶彬译:《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要想实现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就必须改变现代世界体系,或者说必须改变现代世界体系成为劳工阶级达成国际团结的基本条件。现代世界体系由经济上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政治上的民族国家体系构成,其中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发挥着巩固和强化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作用,而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又是一个少数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广大半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等级性结构体系,列宁将这种等级性结构体系称为“帝国主义”。<sup>①</sup>因此要改变现代世界体系,首要的方面在于改变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重中之重就是要改变民族国家之间的等级性结构,也就是说,劳工阶级必须强大到足以驯服核心国家,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至少在欧美几个核心国家同时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虽然几经变迁,但是少数核心国家占据支配地位的等级性结构并未有实质性的改进,它们仍然依靠强化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和劳工阶级的分裂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核心国家构成了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最大政治障碍。

核心国家起初并不是一个组织化的集团,不同的核心国家为了争夺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和生产剩余分配的控制权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冲突,在20世纪甚至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争夺霸权地位的斗争,而冲突的结果就是霸权地位在核心国家之间的转移。阿瑞吉指出:“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sup>②</sup>当前国际体系就处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之下,美国霸权将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组成一个集团,并且通过军事安全、利益保障、妥协机制来维持核心国家集团的内在协调和外在一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且巩固了核心国家在等级性结构中的支配地位。从劳工阶级反抗史的角度来看,美国霸权主导的核心国家集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回应,它是幸免于革命的核心国家联合起来控制阶级冲突、阻碍劳工阶级走向国际团结的重要治理框架。<sup>③</sup>

当然,任何世界霸权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每一次世界霸权的转移都意味着新的世界霸权必须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西尔弗和埃里克·斯莱特(Eric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4页。

② 乔万尼·阿瑞吉著,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漫长的20世纪》,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32页。

③ 汪仕凯:《全球劳工治理:议题、机制和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69页。

Slater)认为:“每个世界霸权的巩固都预示着能够控制社会冲突的新‘历史妥协’的建立。各新兴集团的共同抉择是极为重要的:在霸权从荷兰向英国的转移中,是美洲资产阶级拓殖者和拥有地产的欧洲中产阶级;在霸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中,是非西方世界的西方化精英和西方世界的工人阶级。但在这两次转移中,霸权集团的社会基础扩大,随之而来的都是世界大多数人口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被排除在同样的权利和特权之外,实际上这也是霸权集团社会基础扩大的前提。”<sup>①</sup>美国霸权将核心国家的劳工阶级纳入自己的社会基础范围之内,这不仅导致了核心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劳工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且借助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力竞争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将利益冲突的根源指向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有效地掩盖了国家之间的等级性结构体系应该承担的首要责任。

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首先应该是一种同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意识。美国霸权主导的等级性结构体系对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压制,已经使一些学者意识到必须检讨将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学术传统,必须将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同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控制联系起来。丹·克劳森(Dan Clawson)指出,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需要一种新的一般性理论,这种理论要“重新认识借助民族国家对不受限制的世界市场进行控制的需要”。<sup>②</sup>当然,仅仅看到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控制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充分理解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异,也就是要充分理解核心国家主导的等级性结构体系同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之间的关系。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不能来源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只能来源于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等级性质的国际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彻底改变核心国家支配和剥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等级性结构。只有当等级性的国际体系能够得到改变时,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才是可预见的,因此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意味着全新的国际政治秩序。

在分析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未来时,以下结构方面的发展趋势特别值得关注:首先,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的变动以及可能转型的迹象。第三世界正在出现世界大国,这些世界大国对欧美核心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它预示了国际体系转向一种以平等、包容、共享为基本特性的新类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将为劳

<sup>①</sup> 贝弗里·西尔弗、艾瑞克·斯莱特:《世界霸权的社会根源》,第165页。

<sup>②</sup> Dan Clawson, “Contradictions of Labour Solidarity,” *Journal of World System Research*, Vol.4, No.1, 1999, p.8.

工阶级国际团结的形成开辟道路。<sup>①</sup>其次,欧美核心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运动的矛盾性质。一方面,反全球化运动具有反对核心国家集团操纵世界市场的内容;另一方面,反全球化运动具有捍卫核心国家内部特定社会阶级利益(包括劳工阶级在内)的内容,因此反全球化运动对于劳工阶级国际团结的形成的影响将是利弊共存的。再次,核心国家内部的新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整合的可能性。核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使劳工阶级内部的差异性进一步扩大,劳工阶级的上层已经发展壮大成在规模上能够与劳工阶级等量齐观的中产阶级,他们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新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经常交叉在一起,所以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需要一种能够将两种运动整合在一起的包容性的阶级身份。最后,核心国家金融业的膨胀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巨额资本转向金融对实体经济和劳工阶级有着很大的不利影响,但是当巨额融资走向金融风暴时将会对复杂的社会阶级划分产生廓清作用,中产阶级规模持续减少以及社会阶级两极化趋势增强,是巨额融资和金融风暴对社会最隐秘的影响之一。

概而论之,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只不过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这种冲突的焦点从单个民族国家转移到了核心国家支配的等级性结构上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劳工阶级反对自身所处的民族国家的斗争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不可能独自改变核心国家支配的等级性结构体系,因此劳工阶级的反抗运动必须要整合进更为广泛的反对国家间政治不平等的历史进程中去,并且要从这个历史进程中抽象出包容性的政治身份,从而实现对不同民族国家的劳工阶级以及民族国家内部的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整合。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是同国际政治新秩序相契合的,只有国际政治新秩序才能为利润服从于劳工阶级生活需要的新经济秩序的形成提供政治保障。因此,劳工阶级的国际团结必须以现代世界体系的改变为基本条件和构成元素才能成为现实的想象。

(截稿:2017年9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sup>①</sup> 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第4—37页。